

五四时期师承关系与现代比较文学观的建立

高晓瑞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与西方文学思想的引入密不可分。五四文坛的论争，亦可看成西方学者的观念差异在中国文坛上的东方演绎。师从白璧德的吴宓与师从杜威的胡适，分别承袭了“昌明国粹”和文学进化论两种文学观念，亦形成了不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并继续影响着各自的弟子。胡适在建构新文学传统的过程中，逐渐转向“整理国故”，由此使胡门弟子和作为追随者的文学研究会同人有了不同态度，呈现出学者与新文化运动者之间的分野。而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文学观，亦在不同师承关系的传承中不断嬗变和发展。

关键词：五四文学 师承关系 中西文化观 比较文学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05

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的文学创作与学术体系在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和影响下，逐步实现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转变的过程中，学人们常常讨论的话题则是中国文化该在哪些方面吸取西方文化的精髓，是应该全盘学习西方还是部分学习西方，以及西方文化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乃至发展的。不论何种讨论，最为核心的问题都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这种趋势下，一方面学人们要构建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吸取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应运而生。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纯粹借鉴，而是近代学人们在不断考察和反思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关系做出理性思考的结果。

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是中国比较文学重要的研究方向。钱钟书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

北学，道术未裂。”^①意指中西文化看似差异很大，但内在却有相互连通之处，因此各个国家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弄清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以来，学者们也多沿着这种思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但实际上，除了从作家们呈现的作品和观点来看他们受到的西方影响之外，少有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切身参与文学活动的人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同一个文人在不同时期，因周围环境和其自身认识的缘故，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在现代文学肇始的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们肩负着启蒙和救亡两重重任，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文艺救国的目的，他们多通过留学吸取西方思想文化。在求学的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师从不同的西方学者，因而受不同观点的影响，这就导致不同的学人在面对中西文化时可能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差异，使得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守不同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文人又逐渐调整自己的中西文化观。整体看来，他们的观念处于变动中。我们将要讨论的，便是五四时期师承关系影响下的几种比较文学观及其走向和流变。

一、西方学者与中国弟子们的中西文化观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们想要通过考试来安身立命的梦想被打破。然而有识之士不会放弃任何一种提升自己的途径，所以晚清以来，不论是政府还个人，都极力主张留学，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思想，改造本国文化。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端的，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但站在新文化运动反面的《学衡》诸人，同样也声名大振。若以往常的评判，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已然成为他们之为新旧的标准。可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胡适，还是吴宓、梅光迪等人，皆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且去往的都是美国，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观？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各自的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深刻地影响了胡适，而白璧德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则浸入吴宓等人的学术观中。这两位洋老师，也许根本未曾想到，他们的学说会经由自己的中国弟子发扬光大，并深刻地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先要讨论的便是师承关系与五四文人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近代西方文化大量引入的产物。曾有看法认为，比较文学之法古已有之，譬如《史记·大宛列传》就提及西亚曾有西王母的传

^① 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序言，第1页。

说。但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定义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要到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实现,其标志之一便是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1924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吴宓,带着从白璧德处承袭的新人文主义,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五四以来,中国高校的学术便大致分为两大板块,一是以北大为根据地的主张革新的师生,二是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为首的对新文学抱有批判态度的学人。吴宓选择南京,某种程度上就显示出他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而这一切与他的“西方师父”白璧德息息相关。

留学哈佛的吴宓选择师从白璧德,一方面与他少时所习有关。吴宓未曾留学之时,就深谙儒家之道,常借孔子之言批评当代学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鉴于后世学者并无实得,而徒东掀西掇一片一鳞即炫示于人,惟恐人之不知也者。此在今日之学生尤为大病。”^①他认为生搬硬套他人之说,不能潜心思考,实为当下学子之弊病。要想纠正,则应重读孔孟哲学:“近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之高,无论其文章、哲理,即所含关于日常事物之规诫,以及政刑礼教之设施,虽一二语而用新眼光、新理想咀嚼寻味,可成千百言,且皆系对于今日对症下药。”^②而对于中国文化未来之路,吴宓则称:“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形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事。然此等事业,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③意指若要求现代学术之进步,非以西方文学的思路来重究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可。

若说幼时的读书经历是吴宓重传统的雏形,那么1918年在哈佛邂逅导师白璧德,则使他形成了完整的中西文化观。白璧德主张的新人文主义涉及层面极为广泛,在文化批判的维度之下,涉及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关注中国儒学。吴宓曾在日记中记载白璧德极其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 Humanists 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④在日常学习中,白璧德对这些中国学生更是期望甚深,“白璧德师及黄叔巍亦均有书来,勗勉有加。予敢复

①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8-279页。

②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0页。

③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04页。

④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2-213页。

有怨尤而自暴弃哉?”^① 所以吴宓称自己从不敢懈怠。后来吴宓等人在办《学衡》刊物时,就广泛地翻译了白璧德的文章,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全面概述新人文主义的主张,二是发表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白璧德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并不能完全等同,“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本身的延伸和继续,新文化运动则是对照西方文化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就忽略了东方固有的文化”^②。白璧德认为,中国谋求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的现代化都是正当的,但问题在于,不应全然效仿西方而忘记保存伟大旧文明的精魂。

白璧德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吴宓的中西文化观,吴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附议》中的表述最为清晰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中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亡,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谓最精确、最详赡、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③

可见在跟随白璧德的过程中,吴宓完全接受了其师白璧德的观念,并将之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在吴宓看来,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全盘否定传统实为不智之举,在面临各方面大变革的五四时期,文人们更应审慎对待中西文化,吸收西方思想,同时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在比较和批判的态度下,吴宓逐渐形成了一种调和中西古今的观点,与他一起受教的几位白璧德的学生(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④,也基本持这种观念。

与吴宓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胡适留学美国,受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思想影响最深。若说吴宓亲近白璧德是因为少年阅读的经验,那么胡适走向杜威,其中起重大作用的则是胡适的怀疑精神。^⑤ 胡适曾在自传中形容杜威给他“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⑥。关于影响他

①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8页。

② 张弘:《吴宓理想的使者》,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③ 吴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附议》,《学衡》(第三期),1922年3月。

④ 沈卫威:《“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⑤ 刘作芹:《浅析胡适走近杜威实验主义的原因》,《科教文汇》,2008年第7期。

⑥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7页。

思想的实例，胡适罗列了几点。首先杜威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是“固定信念阶段”，譬如我国殷商时期的神权时代；第二个阶段是“讨论阶段”，表现为好辩与公开讨论的习俗；第三个阶段叫“苏格拉底的法则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第四阶段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的科学”。最后一个阶段的实证思维是影响胡适最深的。胡适后期的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这种方法的烙印。除此之外，杜威《思维术》中对有系统的思想形成的几个阶段的描述，更是直接影响了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加之杜威本人对宗教向来采取十分理性的态度，认为应多谈科学，少谈宗教，所以胡适把现代的科学法则与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联系了起来，从而更加审慎地看待中国古典著作。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几乎同时留学欧美的吴宓与胡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待中西文化的方式？原因首先与他们留学时师从的西方学者的主张有关，但他们“主动选择”却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文人交往的角度讲，梅光迪等人因为胡适宣扬白话文和反传统而与之分道扬镳，继而他们选择了与杜威观点相反的白璧德作为导师。吴宓等人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实用，少务虚理，可谓长处短处皆汇于此。因此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核心，应以学习西方精神为主。但实际上，近代学子留学欧美，多学建筑、经济、医学等实用学科，在吴宓等人看来，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革新。因此，主张实验主义的杜威自然不能成为吴宓等人的导师。

胡适早于吴宓等人回国并率先提倡白话文，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胡适等首倡者手中，杜威的思想一时之间更是为国人所熟知。这种情形自然激起了吴宓、汤用彤等人的不满。汤用彤曾对杜威来华时学界的热情表示过不满：“其输入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以山额与达尔文同称。以柏拉图与马克思并论。罗素抵沪，欢迎者拟之孔子。杜威莅晋，推尊者比之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輊，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② 言语之间不乏对胡适等人的鄙夷。

不论两派各持何种观点，五四文人的中西文化观却也在各自导师的指引下逐步建立起来。不论其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如何，或是从中衍生出何种比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② 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十二期），1922年12月。

较文学观,各派文人都在五四文坛大放异彩,在一次次论争中呈现各自的文学观,并影响着现代学术传统的构建。

二、中国学人实践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前文我们讨论了在不同西方学者的影响下,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在具体的文学实践里,他们又根据所学,在创作与著述中,呈现出不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一直以来,吴宓都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不仅因为他率先在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更因为他有将比较文学作为学科来建构之心。吴宓曾于日记中写道:一直以来,师父白璧德都对中国教育颇为关心——

巴师命宓作文,述中国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载美国上好之报章。宓遵允之。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以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宓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①

日记深切地表明了吴宓在完全接受导师观念后的宏大志愿:一是要发扬中国文化中的精髓,二是要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让西方世界也能了解中国文化。基于此,吴宓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文学观,亦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实践。

首先是与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们一起办文学刊物,多层次地建构比较文学观念。某种程度上讲,吴宓的比较文学总体思想与《学衡》的主张是一致的。《学衡》在创刊之初,就打出旗帜鲜明的口号:“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②他们是要借亦中亦西、中西并重的态度从理论上来瓦解话语霸权。《学衡》之外,还有《大公报·文学副刊》介绍西洋文学理论,侧重对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译介。吴宓等更借助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平台,编辑《史地学报》,为“东南大学的师生提供一个回望历史的舞台,在历史的时空中寻找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③。

①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页。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一期),1922年1月。

③ 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页。

其次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在中西互见的观点下,吴宓谈论起任何文化以及文学现象,都采取比较和对照的方式,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所以常采用平行比较之法。譬如吴宓在《我之人生观》《诗学总论》《苏格拉底像赞》等文中,多次把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与东方的孔子、释迦牟尼、屈原、杜甫相提并论。论及东西方伦理,则称“读毕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者,则以中庸为正道”^①;论及西方诗歌写作,则认为“Pope之Essay on Criticism及莎士比亚之Hamlet剧中(Act III, Scene i)最著名独唱,论生死之一段,乃正说理之诗。故文与诗,各皆表示思想及感情,兼有其二,不废其一。特若比较论之,则文重思想,诗重感情,略有偏尔”^②。在吴宓的观念中,中西方文学形式及情感表达是有相似点的,因此若要使得中国文学为世人所知,势必要找到中西文化的合流之处,寻求会通的可能性。

再次,在看待比较文学之成果上,吴宓还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其师白璧德看重儒家文化相关。自文艺复兴以来,反抗神权、寻求真理成为西方人所追寻的主要目标,科学、经济等领域也随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繁荣的同时却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譬如道德的沦丧、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白璧德认为西方人堕落的根源在于过度追求自然法则,而忽视了人的法则,所以白璧德非常看重中国的儒教传统。吴宓对此深以为然,他不仅坚守儒家思想,还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礼者,适宜之谓。乃精神上行事做人之标准而非形式上步履饮食之规矩也。”^③ 吴宓认为孔子与儒家所宣扬的礼义,能成为当代中国和西方人所信仰的典范,能去掉人性中的恶,解除精神危机。所以儒家的仁爱和中庸与西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结合,便成为吴宓比较文学观念里“中西融合”的基础。

当吴宓还在美国畅想着现代“为人之道”对中西文化的革新时,国内却早已发生了巨变,同为留美学生的胡适早已在国内兴起了新文化运动。鉴别五四文人是否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有贡献,主要看他是否翻译过西方文学作品,以及其文学研究是否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虽未在高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却在文学实践、文学批评以及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如前所论,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杜威实验主义的观点,因此在看待现代文学发展时,他更倾向于学习西方,整体上持文学进

① 吴宓:《我之人生观》,《学衡》(第十六期),1923年4月。

② 吴宓:《诗学总论》,《学衡》(第九期),1922年9月。

③ 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

化论的立场。胡适认为文学进化论包含四层意义：其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二是文学始终处于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其三为文学进化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会带有前一个时代留下的无用的痕迹；其四则是胡适文学进化论的基础——“一种文化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化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的吸取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此种例在世界文学史上，真是举不胜举。”^① 胡适看来，英国文学能在近百年发展，皆是受欧洲大陆国家的影响。中国文学不曾与欧洲大陆的文学接触，故发展较缓，可细查之下，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形式竟早已潜移默化地染上了域外文学的色彩，譬如六朝至唐的“龟兹乐”“拨头戏”。但囿于千余年来戏剧在中国文学中所占的分量有限，且所学西方之处皆为幼稚的技巧，故进益不多。“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作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在文学进化论以及学习西方必能改造中国文学的思想下，胡适认为“比较的文学研究”至少能产生两种益处，其一是“悲剧的观念”，其二是“文学的经济方法”，若能从内容及形式两者上给予中国文学变革，那必能创造出“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③ 的文学作品。

除了在具体的文学技巧上借鉴西方，有学者认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题”^④。其原因在于胡适不仅提倡向西学习的方法，还把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与欧洲各国摆脱拉丁语而使用民族语言相提并论。胡适认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皆是先有各地方言，然后才有了伟大的文学家，靠作品的魅力使得方言风行全国，从而建立起“国语”来。^⑤ 而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白话小说或戏剧，“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曾成为文

①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②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③ 胡适：《论短篇小说》，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④ 高旭东：《胡适与中国的比较文学》，《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⑤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①。胡适从整体上，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进行了历史和语言革新上的宏观比较，呈现出对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控。从某种意义上讲，重视文学进化论，体现出胡适看重影响研究的态度；承认五四文学的发展类似于西方各国的“文学—语言”的革新，又显现出平行研究的特点。

三、立场与身份：新文化运动者与学者的分野

西方学者与中国弟子们的中西文化观，以及从中生发出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终究只存在于对某些文学问题的探查中。但师承关系的影响远不只涉及文学问题，它还涉及文人与学者的身份差异问题。

从五四文坛的分化来看，吴宓代表的“学衡派”与胡适代表的“新阵营”本是水火不容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带着西方的思想回到国内时，成为国内青年们的“精神导师”。五四时期的观念生产是一种群体生产。一种声音要形成潮流唯有依靠群体的力量，师承关系亦是群体关系的一种。师承关系作为一种传统人际关系，作用于文人的聚合离散。以某位文坛大师为中心，加上一群仰慕其思想的青年，或能形成一个乃至几个文学社团或文人圈子。所以五四文坛中的大师往往兼具双重身份，一是广大青年们的“知识权威”，二是能传承自己学术的及门弟子的师父。对青年人来讲，若有庇护自己的文坛大师，那么进入文坛之时，自己的观念也更易传播开来，自己便更易在文坛立足。所以，对于胡适、吴宓等留学生以及受他们影响的青年学子而言，现代师承关系影响深远。

跟随胡适观念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与吴宓影响下的东南大学学子，在《文学周报》上就新旧诗、白话与文言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是青年们进入文坛的途径之一，在创造社同人与文学研究会观念之争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现代师承关系影响下的文学立场，以及文学和学术的分野这两重问题。

从中西文化观的角度来讲，胡适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竟有类似吴宓“融会中西文化”的韵味。其实早在1919年12月，胡适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在文中高调地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放在“研究问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题、输入学理”之后,使之成为“再造文明”^①的手段。在胡适看来,“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②,传统文化的“真价值”“真意义”被“胡说”“武断”所掩盖,而明珠蒙尘的关键竟在于“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③,因而“整理国故”最终需达到一个各家都还他一个“真面目”“真价值”的目的。

从胡适的论述看来,在开始提出“整理国故”时,其对旧有学术尤其是儒教思想评价并不高,此时胡适内在精神上更偏向于“打倒孔家店”。而对于何为真正该弘扬的“国粹”,胡适并没有清晰的说明,他刻意强调“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反倒像是倡导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而非研究的内容。但可以察觉到,胡适此时的观点较之五四运动初期已有缓和。他对“整理国故”的限定,使之既不同于守旧派的“浸淫于古籍”,又不同于新派的“有新旧”,而是呈现出中立客观的学术态度,一定程度上与吴宓“融会中西”的理想有了契合点。

这种态度的转移是符合新文学建设的。五四运动在否定传统文化之后,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但现代文学却缺乏正宗的“来源”,即现代文学亟须回答它该归根于何处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纵然把西方当作“师父”,也依旧无法解决它立足的合理性。归根结底,它只能从中国文化本身找来源。正如有学者论:“他们提倡白话文,并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恰恰又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传统,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新传统。”^④

因此胡适虽把“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环,但仍是时刻怀着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如早期研究者伍启元所说的,“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或是陈端志的“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不可越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8页。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3页。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4页。

④ 王本朝:《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过的一种步骤”。^①就领导者而言，他们是力图把五四运动中那种极端的、抑东扬西的宣传方法，逐步地引导，使之走向学术研究的层面，“以历史研究所特有的纵深度，以为一结合新旧文化的现代文明在中国之诞生，提供一块足以连结古今，沟通中西的基石”^②。作为大师追随者的文学研究会也恰是沿着胡适提出的这种方向前进的，不仅因为文学研究会中的一部分成员与胡适有师徒关系，更因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会章程中“整理中国旧文学”的文学理念产生了极大共鸣。

虽然“整理国故”之风日盛，可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依然处在新旧交锋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新的论争随时会爆发。新文学界在“整理国故”之风日上后，又迎来了当头一击。随着对国故的重新重视，复古之风似又复燃。陈独秀在所编的《前锋》杂志上就已点名批评胡适在国学方面所花的精力。吴敬恒更是写下《复蔡子民先生书》和《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投往《晨报副刊》。前一篇文章主要谈现代社会应更重科学与工艺的问题，后一篇文章则针对国内读古书的风气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称“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什么叫做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③。言下之意，胡适及北大国学门，包括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整理国故”是大为不必要的。

面对新文学界的言论，文学研究会内部就“整理国故”产生了变化，出现了反对声。沈雁冰敏锐地发现了此种征兆，直接指出这种现象在新文学界中由来已久。赵景深亦附议，“许多青年近来沉醉于古文，蔑视新文学”^④。时下《学衡》反对白话文，主张文言文，自是“反动运动”的第一支，沈雁冰认为《学衡》诸人“本不敢如此猖獗的”，未曾想有人主张文学“嘤嘤不休”，他们竟也“攘臂加入”。其次，“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因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⑤从沈氏观点来看，是“整理国故”的一班人导致了新文学界的这一变动。随后，文学研究会内部亦开始了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与清算。

① 转引自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1年。

③ 吴敬恒：《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晨报副刊》，1923年7月23日。

④ 赵景深：《答雁冰先生》，《文学》（第一一二号），1924年3月10日。

⑤ 雁冰：《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学》（第一二一号），1924年5月12日。

概括而言,文学研究会对“整理国故”的提倡起于对文坛领袖胡适的支持和社团自身的设定,但是随着1924年文言文的回潮、复古风气的兴盛,白话文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文学研究会成员又不得不反思这场“整理国故”是否客观上给新文学运动的成果造成了伤害。虽有人仍能客观看待“整理国故”的意义,但亦有不少人认为它该负极大的责任。这场运动逐渐偃旗息鼓,最后成为少数学者的研究工作,如胡适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等。“整理国故”从一开始的团体作战,到后来的集体倒戈,最终只余胡适与及门弟子还在坚持,某种意义上体现出现代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研究会同人在“整理国故”受到质疑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观点正确或完善与否,而是如何与其他观点保持一致,体现了他们在追随导师时的独立性。但现代师承关系中的及门弟子仍依然保持着传统师徒门派传承的特点,即使自己所处的社团对导师的主张进行批判,自己也依然不改初衷,甚至发扬师父的治学理念,在研究方向上走得更远,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就是这样的范例。

文学研究会同人与胡适弟子们的不同态度,还暗含着新文化运动者与学者之间身份与立场的不同。不论是胡适还是吴宓,他们的所有文化积淀与文学想象,都是建构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上的,除却中西文化观的差异,他们对文学与学术都有纯正的研究态度。而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文学研究会,其文学理想则在于如何巩固新文化运动的既有成果,并使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而从后期胡适的主张以及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方法来看,他们对吴宓的文学态度,其实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与靠近,相比文学研究会的“非此即彼”,呈现出文学运动与文学研究的分野。

综上所述,五四文学的整体发展,其实是在多方文化门派的冲突、嬗变,相互学习又相互制衡的环境下进行的。通过西方学者的观念引导,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由中国学人建构并发扬光大。而在立场和观念、文学与学术的博弈中,持不同观念的中国学人又在不自觉地彼此靠近。所以当再次论及五四文学时,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所谓的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以理解的眼光来看待五四文人的转变与回归。

作者简介:

高晓瑞,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